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WEN HUA DA GE MING DE QI YUAN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美） 爱德华·希尔斯 著 王学东 译

第一章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罗克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译组 译

何祚康 王泽槐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 人民内部矛盾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著

何祚康 王泽槐 校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 2插页 17.75印张 478千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I S B N 7—202—00364—3/D·33

定价: 7.10元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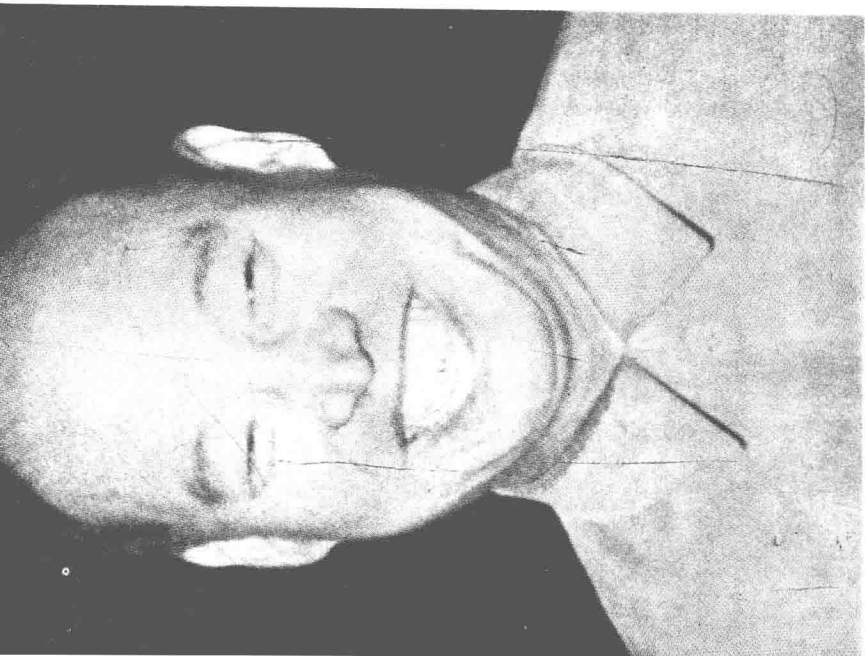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毛泽东 www.ertongbook.com



2 刘少奇



3 周恩来



4 彭真



5 邓小平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引自《水浒传》

编者的话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欢呼声中从天安门广场升起 17 年之后，在我国发动了一场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创立的一切几乎毁之殆尽，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革命”。直到 1976 年，10 亿中国人才从恶梦中醒来。

正当全民族为此进行痛苦的反思和自省的时候，一个“局外人”，通过自己对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方面主要事件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的深入考察和思索，也拿出一份颇有份量、值得我们重视的答卷。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部颇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专著。全书分三卷，100 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3 年由牛津大学和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第三卷正在撰写之中，可望近期问世。

该书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先生是英裔美籍著名学者，英国工党前议员、政治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享有盛誉的中国问题专家。当1956年—1957年中国发生一系列事件的时候，麦克法夸尔刚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毕业，应聘担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他就开始撰述有关这些事件的文章。1962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更增强了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信心。196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新文献，从而越来越意识到，把当代和文化大革命所透露的材料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从1956—1965年的中国历史上追溯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971年秋，他被委任为英国皇家国际事物研究所研究员，1972年在该所的赞助下，第一次对中国进行了访问。1984年，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邀请，麦氏带着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前两卷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新开了一门基础课，名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选读这门课的学生达700多人，是本学期最大的一门课，麦氏应邀担任主讲教授，有20多名助教协助他。麦氏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百花齐放”与中国的知识分子》（1960）《中苏论战》（与人合著，1961）《中美关系（1949—1971）》（1972）《封闭的城市》（1972）《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1979；第二卷，1983）。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其代表作。

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部宏篇巨著中，麦克法夸尔试图回答：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将经过巨大努力才建成1966年那个样

子的中国政权，下决心完全摧毁，然后再加以重建呢？

麦氏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应该从1956年开始，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源头。

合作化被认为是巩固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一步。当合作化的完成近在咫尺时，毛泽东宣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以此作为一个机会开始发动中国两个经济上的“大跃进”，此后5年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花了很大力量谋求经济上的突破。1960年，在人民的痛苦声中结束了“大跃进”。这引发了领导层中的分歧，它使人们重新评价发展战略。

苏共二十大和随之而来的非斯大林化，使毛和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关心苏联演化的方向，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及提出的一些新理论，更加引起了对苏联领导人的能力以及领导共产党集团的方法的疑虑，这些疑虑不安由于1959年赫鲁晓夫准备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加剧了。从1956年起，中国开始谴责苏联与帝国主义妥协，但是当这些责难没有能够使得苏联领导人回心转意时，毛开始重新审视苏联社会，试图理解是什么使苏联偏离了毛所认为的真正的列宁主义道路。60年代中期，毛完成了对苏联社会的分析，认为必须防止中国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路，因此，党和国家就需要重新建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试图为中国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文化大革命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对于它的发生原因的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定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观点，作者在本书中详细地考察了1956—1965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从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到第一次“跃进”，从“百花齐放”政策的制定到整风运动，从

整风到反右运动，第二次“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苏论战等等，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当然，这项研究不在于“提供一部 1956—1965 年的中国的全面历史，而是试图审视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相互间关系的影响”，在上述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分歧和争论后来日趋激化，逐渐上升为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条是以“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毛为什么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离不开对中共领导人行为的研究，尤其是有 3 个人物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被当作魔王抛弃了的刘少奇，和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反复的运动中幸存者周恩来。作者在本书中用了不少的篇幅叙述了他们的性格特征，思想和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力图从中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某种原因。

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不能不引起毛等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中共八大的新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提法，以便于强调集体领导，毛也决定他将逐渐把权力交给他的同事们，以避免苏联斯大林死后出现的那种拜占庭式的斗争在中国重演。但另一方面，毛也开始怀疑，他的一些同事倾向于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谴责作为削弱他的地位的机会，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自身的矛盾——他的让出权力的意愿和对他的同事们急于掌权的疑虑，在本项研究所涉及的 10 年中，随着两次“跃进”、整风运动的挫折，以及毛泽东年龄的增长，这种疑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悲剧，这场悲剧的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给国内致力于这一研究的人们提供一本比较系统的专著，我们推出了麦克法夸尔先生的研究成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第一、二卷的中译本。我们认为，该书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麦氏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独到的看法和见解，及其考察问题所依据的一些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赞同本书中的观点，而且有些观点与我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为了尊重作者的权利，我们只对个别的部分作了删节和技术处理，对于书中一些史实方面的明显舛误，我们一般采取加“译按”的形式予以说明。我们充分相信，读者们在阅读该书时，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该书中译本的问世，如能给热衷于这方面研究的国内读者提供一点微薄的帮助，将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为了保证该书的质量，我们邀请了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审阅了全部译稿，廖老还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

序

廖
盖
隆

还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西方的许多学者就已开始对它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种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以至几乎成为西方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正式把“文化大革命”列为一门基础课,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国外已经出版的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中,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无疑是具有较大影响的一部。

在已出版的本书第一、二卷中,作者以严肃的态度,根据他所能掌握的大量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详细地考察了1956—1960年间中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党内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

释。

麦克法夸尔先生是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见长。但是，由于作者的研究资料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书中的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书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这种启发既有观点方面的，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例如虽然作者象西方许多史学家一样，注重对历史事件中人际关系的分析，但他又往往透过人际关系的表象，指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又例如，为了揭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搜集、整理、查阅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等各个层次，以及当代国际共运和东西方关系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周密的分析和研究，其功力和方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起来说，1966年起发生的10年“文化大革命”，正如1958年起发生的3年“大跃进”，和毛泽东在这两个时期的其他失误一样，主要是毛泽东从1957年起形成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向所谓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乃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左”倾错误思想的产物，是他在一系列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欣赏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所造成的，也是从共产国际和苏联学来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的严重缺陷发生了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背离了他自己一直提倡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则，从而同党的领导层的多数发生了和激化了意见分歧。所以在我看来，麦克法夸尔教授关于50—60年代中共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愈来愈发展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以

便避免今后重犯。

我认为，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介绍一些国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方面的著作，不仅可以使我国史学界、党史学界及时了解国外同行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也有利于借鉴他们的一些研究方法并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对于推动我们的研究工作将是大有益处的。

1988年10月于北京